

传统民本思想在先秦已经产生,发展并融入社会文化,社会学家金耀基教授曾用“中国之民本思想,实澈上澈下,流贯中国五千年之政治”来描述民本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。

朱子民本思想之源

中国早期文化将人类社会的秩序和道德价值归源于“帝”或“天”。周公提出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”,把天命与民意做了朴素关联。此时,民本思想虽未成体系,但统治者对执政方略已有所思考。

孔子总结发展三代民本思想,并将思考核心落到“人”,放大“人”的分量。他提出“道千乘之国,敬事而信,节用而爱人,使民以时”,即治国不可打乱人民按自然时令的生活规律。孔子用“仁”

居乐业,才可消除民反隐患。朱子不论为官抑或赋闲,都重视恤民。1168年朱子闲居崇安县开耀乡(今武夷山市五夫镇)他与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共同创办“社仓”以积谷备荒。村中设仓藏粮于民,惠及乡村饥民,是我国古代荒政史上一大创举。朱子知南康军积极筹粮救灾,募民修堤,以工代赈,既解决了灾民缺食问题,又修筑了河堤,“实为公私久远利济之惠”。

再次,朱子主张轻役宽民力,反对繁重夫役。南宋孝宗时,全国各地试行“义役”制,即役户共同出钱买田资助当役之人。但豪强实际把持义役田和役次推排,下户吃亏。朱子批评此“义役制”是“困贫民以资上户”,妨碍农业生产。朱子还主张“爱养民力”。在朱子看来,只有“宽民力”使民得以休养生息,才能更好地发展

国以民为本 社稷亦为民而立 ——朱子民本思想探析

□沈毅玲

来描述人与人的关系,君对民之“仁”,实对国之“仁”。孟子追随孔子,进一步提出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等思想。荀子则以“舟水”之喻警示统治者,提出“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”。

金耀基教授认为儒家民本思想有几个基本要义:首先以人民为政治主体,强调民有、民享;其次天立君为民,君主居位须得人民同意,“革命”与民本实为一体两面;再次,“保民”“养民”“化民”乃人君最大职分;最后,民本是“义利之辨”“王霸之争”及“君臣之义”等的判准。

朱子阐释和发展了儒家民本思想。他为《四书》做注,将观点阐发其中。历代帝王对“民本”之贯彻令其甚为愤疾:“千五百年之间……虽或不无小康,而尧、舜、三王、周公、孔子所传之道,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。”他提出“天下者,天下人之天下,非一人之私有故也。”这一观点超越了封建社会“家天下”的普遍认知,也奠定了他“民与国”关系论断的基础。他指出“国以民为本,社稷亦为民而立,而君之尊,又系于二者之存亡,故其轻重如此”,以此呼应孟子的“民贵君轻”。在施政方面,朱子提出“王道以得民心为本”“有天下者,能存此心而不失,则所以絜矩而与民同欲者,自不能已矣”。

朱子爱民之举

朱子对民本的追寻不仅是思想上的探讨,终其一生,亦是在践行民本理念。他倡导薄赋、恤民、宽民力、兴教育,这四个方面集中且直接地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。

首先,朱子主张薄赋,反对重敛。他以陆贽之言劝喻孝宗:“民者邦之本,财者民之心,其心伤则本伤,其本伤则干涸瘁而根柢蹶拔矣。”从国家长远利益着眼,征赋切莫竭泽而渔,应“视入为出,罢去冗费,而悉除无名之赋,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”。薄赋让人民有所劳且有所得,直接提高人民的获得感。朱子在南康军知军、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、漳州知州等任上,均采取措施减免赋钱和整顿赋税名目。

其次,朱子认为“天下国家之大务,莫大于恤民”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,执政者体恤民心,使其安

生产。

最后,兴教育,为社稷育才。朱子寻访、举荐民间贤达,使其为国家社稷效力。朱子知南康军发布《招学者如郡学榜》称“无籍者给食,有籍者以差补缺职事”,惜才爱德之心可见一斑。“漳上真儒”陈淳便是朱子知漳时延请至州学的贤人,成为朱子理学重要传人,所著《北溪字义》被尊为“东亚第一部哲学辞典”。朱子为官时日不长,任上多次兴建书院,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。这一为民启智、使人善学之举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书院文化。

朱子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

史上,传统民本思想曾为安邦治国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习近平总书记亦将“民惟邦本、政得其民”标举为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启示。2021年3月,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,在朱熹园中说,朱子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“以人民为中心”有很多一致的地方,要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,增强文化自信。对朱子民本思想继承与发扬有了新的时代意义。

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,以人民的立场为根本立场,把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”作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,习总书记以“人民就是江山,江山就是人民”这一掷地有声的论断,向世人宣告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把民本理想转变为现实的政治力量,切实贯彻到治国理政实践中。

“十四五”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年。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。党和国家聚焦民生福祉,注重人的全面发展,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创造高品质生活,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让百姓有更强获得感。

汲取传统民本思想精华,结合时代需求,实现对传统民本思想继承与超越,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智慧的体现,也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伟力。

(沈毅玲,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,新闻传播学博士,硕士生导师;挂职闽南日报社副总编。)

南宋绍熙元年庚戌(1190年),朱熹61岁,知漳州。夏四月赴任。《朱熹年谱》载:此时“临漳泰号道院,比年风俗衰薄,先生以礼未知礼”。朱熹上任后,首颁礼教,兴学校,建紫阳书院,实施教化。斯时,漳州民风不纯,可知是郡官风不正。对此社情,朱熹说:官吏、士人“先要识个廉退之节,礼、义、廉、耻,是谓四维,若寡廉鲜耻,虽能文,要何用?某虽不屑,深为诸君耻之。”然而,再混杂官衙,亦有清正之人。物色选用良吏司理政务是当务之急。于是,朱熹经过调查审核,启用赵师愈主事公务。朱熹高足陈淳称赞说:先生熟闻知谏赵师愈之为人,试之政事,又得其实,遂首举之。其词曰:“履行深醇,持心明恕。”闻者莫不心服。对清正廉明部属,委以重任,树立榜样。这是,朱熹整肃漳州官场第一步。

针对官场作风懒散,官吏精神萎靡,推诿责任混日子的不作为现象,朱熹强调“做官须是立纲纪,纲纪既立,都自无事。”立纲纪,即是立“礼、义、廉、耻”之四维。

民不识礼,官乏四维,以“理”教化之。这是朱熹治理漳州的法宝。《尚书》云:“若升高必自下,若涉险必自迺。”要改造民风民俗,要整肃官场陋习,必须从基层抓起,从细微处入手,从人心抓起。朱熹是集大成之理学家,深知人民情怀,尤其重视以理教化之作用。于是,他的“彻人心,洞天理,达群哲,会百圣,干乎洙泗伊洛之绪”,在改造漳州民风、官风发

朱熹仕宦漳州实践:

讲“诚意”,反“苞苴”,正心理政

□陈镜清

挥巨大作用。他不仅创办书院,注《四书》,兴理学,发布《谕俗文》,而且亲自出马在白云岩开讲《诚意》章。

“诚意”,系《大学》八条目之一。诚,是指真实无妄;意,系指心之所发。“知至而后意诚”。朱熹用《中庸》中的“诚”的范畴来说明他的“理”。他说:“诚者,真实无妄之谓,天理本然也。”(《中庸章句》)“诚者,实理之谓也。”朱熹认为,“诚,实也。意者,心之所发也。实其心之所以发,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。”他认为诚意就是不自欺欺人,就是独善其身,就是表里如一。诚意,“以其体”来说,“有仁义礼智之实”。“以其用”来说,“有惻隐、羞恶、恭敬、诚意,是非之实。”这样,朱熹用“诚意”将“仁义,礼智,惻隐,羞恶,恭敬,是非”等都概括为“理”的内容。他强调先有对时代社会伦理的深刻认识,才能在个体内心树立“修己”的诚意。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,朱熹写道:“圣人之德,所性而有者也,天道也……由教

而人者也,人道也,诚则天下明矣,明则可以至于诚矣。”他强调了“天道”与“人道”的合一。朱熹把政治与道德联系起来。“人君之学与不学,所学之正与不正,在乎方寸之间……盖格物而致知者,尧舜所谓精一也。正心诚意者,尧舜所谓执中也。”可见,正心诚意仍是朱熹守漳的中庸政治理论基础。

关于“居天下之大居,行天下之大道”,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云:“广居,仁也;正位,礼也;大道,义也。”仁、礼、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,也是大丈夫的理想人格。这句话的意思是,大丈夫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处——“仁”里,站在天下最正大的位置——“礼”上,走在天下最光明的大道——“义”上。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,行得正,站得直,为着一个理想的目标去奋斗。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“诚意”。

反“苞苴”,是朱熹治理漳州府官场不正之风,制止民间社会交往不良习俗的重要举

编者按

朱熹是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,一生致力于理学探索,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,被称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。漳州是朱子在福建主政的唯一城市,拥有丰厚的朱子文化资源。今天是朱熹诞辰891周年纪念日,本版特编发一组文章,从朱子论民本、担当、德教和廉政四个方面进行深入阐发,以期读者从中了解朱子思想的现代价值。

朱子论担当

□王志阳

心。”以心坚守成为圣人之志,才能为后续的践行圣人之志提供坚实基础。

二、践行担当之事

“善在那里,自家却去行它。行之久,则与自家为一,则得之在我。未能行,善自善,我自我。”树立勇于担当的圣人之志,自然是善,但是只有通过行,即实践才能将所树立的圣人之志转化为具体成果。

从小事做起。立有担当的圣人志向,要从小事做起,正如登塔的过程。朱子说:“问学如登塔,逐一层登将去。上面一层,虽不问人,亦自见得。若不去实踏过,却悬空妄想,便和最下底层不管理会得。”正是通过掌握知识,再付诸实践,才能具备实现理想的基础,重心在于学生的具体实践。朱子说:“某此间讲说时少,践履时多,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,自去体察,自去涵养。书用你自去读,道理用你自去究索。”学生要将前述所述圣人之志作为起点,从具体实践做起,才能将立圣人之志转化为行圣人之事,否则大志向只是一场美丽的误会而已,即“人所以易得流转,立不定者,只是脚跟不点地。”故脚踏实地才是实现圣人之志的有效途径;

以持敬之心行担当之事。除了从小事做起之外,还需要将持敬之心贯穿于各项行之中,方能慎终始。“敬是立脚去处”。这是因为持敬能够使人专一于所做之事。朱子说:“只敬,则心便一。”其心理状态则是畏怕之态,即“敬,只是一个‘畏’字。”这导致其集中精力于一事的做事方式,即“敬是始终一事”,正是以专一的心态来严肃对待所当为之事,才能将该做之事做到最好的情况以完成自身的社会责任。

立德树人 内外兼修 ——朱子德教思想漫谈

□郑晨寅

“五教之目”,可见其教育的主旨正是发明儒家伦理道德,并列出相应的为学、修身、处事、接物之方,可视为“小学”阶段的进一步升级,从而构建了“讲明义理,以修其身,然后推以及人”的德教体系,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从此亦成为此后中国乃至东亚书院的通用学规。朱子的德教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颇具借鉴意义:

一、在顶层设计上,以《大学》立其格局

自宋代以来,《四书》逐渐取代《五经》的地位,成为儒家新经典,而《大学》又居其首,这与其以“明明德”为首、由“格物致知”入手的“三纲八目”之独特理论架构关系密切。故程子称:“进学入德之门,无如《大学》;其他莫如《语》《孟》。”朱子对此作了进一步思考、阐发,如其“临漳本《四书》”次序即为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;其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成为儒学诠释学的经典之作。在朱子看来,相对于小学,古之大学教的是“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”之道,“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,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”,是“正当学问”。应该说,《大学》这种平实而又高远的格局立意、环环相扣而又螺旋上升的进阶方式,将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目标(“内圣外王”)紧密结合的论证思路,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无数仁人志士所践行,也对今天的学校德育工作具有参考价值。

二、在工夫路径上,既“尊德性”又“道问学”

“工夫”,是指学者通过一定的学习、修养、磨炼而接近价值本体的过程。《中庸》称:“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,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。”“尊德性”,强调的是对“天命之善性”的内省与唤醒;“道问学”,则是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”之概称,

是知与行的统一,二者亦可谓“合内外之道”。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本不可偏废,但学者在为学、设教的过程中,难免会有先后缓急之别,理学史上的“朱陆异同之辨”大体因此而起。朱子于此亦进行了反省,结合程子之“涵养须用敬,进学则在致知”,其学终臻于大成。对今天的学子而言,一方面要注重自身德性的培养,另一方面也要格物致知、力行不辍,如此内外兼修、文质彬彬,才能行稳致远。

三、在师法对象上,以圣贤为楷模

“德是得诸己”,朱子十分重视发挥学者的主体性;“德不孤,必有邻”,他也同样重视榜样的力量,所到之处,不忘表彰先贤、树立学子效仿之典型。如其任同安主簿时,向朝廷申请为同安乡贤、北宋名臣苏颂立祠;知南康军时,在军学讲堂东面建周敦颐祠,配以二程,西面建陶渊明、刘洙等五贤祠;知漳州时,上《乞褒录高登状》,为乡贤高登平反昭雪。至于其晚年于建阳沧州精舍,既祀孔子与颜、曾、思、孟四配,又从祀以周濂溪等七子,彰明道统,开辟了后来书院祭祀先圣先贤之先河。同时,除了追慕前辈之外,他还注重表彰时贤,如其知漳时颁布《延郡士入学牒》,以德行、学问兼备的黄樵仲、陈淳等八人为诸生之“良师畏友”,延请入州学作为表率;并黜落州学中一名品行不端的张姓教授,以整肃学风,漳州理学亦自此开新。“见贤思齐”,我们今天树立“时代楷模”“道德模范”以及“感动中国人物”等典型,倡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,目的也在于此。

(郑晨寅,漳州城市职业学院教授、黄道周与闽南文化研究所所长,著有《黄道周与朱子学》及古籍整理等。)

但变换名目,多是做忌日,去寺中焚香,于是皆有折送,其数不薄。间有甚无廉耻者,本无忌日,乃设为忌日焚香以图馈赠者。朝廷诏令,事事都如此无纲纪,人人玩弛,可虑!可虑!”于是,朱熹知漳“忽行下文”,反对“苞苴”,制止官场行贿馈赠现象,惩罚受贿行贿者。

对于官员胥吏“甚无廉耻”的“图馈送”行为,朱熹坚守以“正心理政”,采取了许多抑制、惩罚的办法。首先严法纪,重申“有司只得守法”。再者,重教养,创办学堂,“以一邦之人共趋士君子之域,以体明朝廷教养作成之意。”次之,纠廉耻。在官吏士人中强调道德修养。他严肃地指出:“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,礼义廉耻,是谓四维。若寡廉鲜耻,虽能文要何用?”再次之,把关节。他针对行政事务“一付之吏手,一味之邀索,百端阻节”的“胡乱行移”,采取严厉的督查,把繁行政事务的每个办理环节,并且下令下属官吏清清白白“交割职事”,对其有作弊索礼行为者,追究到底,严惩不贷,督导官吏理政理得正。

做好“正心底工夫”,理政不偏不倚。这是朱熹守漳理政的原则。

(陈镜清,闽南日报社高级记者(已退休),现为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,厦门贤筓书院特聘教授,厦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。)